

增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

先秦至隋唐五代卷

楊翼驤 編著
喬治忠 朱洪斌 訂補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先秦至隋唐五代卷

杨翼骧 编著

乔治忠 朱洪斌 订补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先秦至隋唐五代卷 / 杨翼骥编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10156-1

I. ①增… II. ①杨… III. ①史学史—中国—先秦时代~五代十国时期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378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先秦至隋唐五代卷

杨翼骥 编著

乔治忠 朱洪斌 订补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156-1

2013年10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1/4 插页4

定价: 88.00元



南开大学史学史学科创立者杨翼骧先生



杨翼骧（右）与乔治忠



乔治忠（左）与朱洪斌

翼骧先生：

承赠中国史学史资料宋代卷，谨此：此书搜罗甚富，大有益于宋代史学的研究。不知全书共有几册，撰写出版如何安排，是否可以示其梗概，以便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

此间编辑12卷本中国通史，于各卷首，请有关专家题字，以资纪念。我想请您为通史宋代卷题字，只有四个字：中国通史，并署上大名，加盖印章，如蒙惠允，当为本书增加光辉，专此奉愿。顺颂

文安！

白寿彝

1954.8

纂修《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感言

(代序)

乔治忠

著名史学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业师杨翼骧先生，一生矢志于研讨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中，以及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先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2003年春，在先生辞世后的月祭，曾写有悼念文字，及今已倏忽十载，谨摘略如下，以志怀想：

先生辞世已盈月矣，然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于吾侪寤寐之间。念先生一生，沉潜勤勉，孜孜然治史、教学，学至深、识甚广，以学识益世者多矣，纸笔焉能尽述！乃略举一二，仅为管窥蠡测。

先生撰著，卓然立于学术之林者，约略有四：

其一曰《秦汉史纲要》，是书刊行于1956年，随即风行在莘莘学子之手，宣讲于大学课堂之上。33年后，仍被评为“筚路蓝缕之功，则非后来的著述可比”。

其二曰《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先生主编其古代部分，1983年出版，为最先面世之卷，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全书编纂冲锋陷阵，提供经验。国内国外，一片赞扬，称之“开创性的可喜成果”。

其三曰《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乃多卷本著述，已出三册。是书集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于一身，以扎实功力体现高超学识，为研治史学史之学人铺路架桥，提供资料与启迪，意蕴有如洪波浩荡之长江、大河，吾辈被泽受益，吾乃饮河之鼠，各饱其腹而已矣。

其四曰《学忍堂文集》，是书荟萃先生论文，益精益博，创见纷呈。亦有以人生体验、治学心得指导后学之篇，其寄望也切切，其教诲也谆谆，感人肺腑，莫此为甚。

先生自1953年至南开大学任教，50年间兢兢业业，创树实多，择其要者有二：

其一，创建南开古籍整理研究所。是乃乘国家重视古籍之东风，得学校信任支持之委托，筹措部署，开基创业。招聘人员，不拘一格，更恪守规范。于时正气炽焉，淳风立焉。

其二，创建南开史学史博士点。八十年代，先生为南开大学创建了中国史学史博士点，是当时全国仅有四个同类博士点之一，南开于是拥有一项特色专业，此乃超越几多优势高校，大为南开历史学科增色。其他历史学博士点或由几名教授共同争取，而史学史则全赖先生一人的学术业绩与声望。……

其中《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之书，是杨先生筹划甚早、致力最多而在学界影响极大的著述。先生何时决计编纂此书，今已不能确知，但1957年于《南开大学学报》发表《三国两晋史学编年》一文，表明此前即已构想成熟，且实质性撰写工作已然开展。1987年，《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出版，起于先秦，至于隋唐五代；1994年第二册面世，内容范围包括北宋、南宋以及辽、金；第三册内容是元、明两代，交稿日期乃1996年底，而当时图书出版尚为旧式铅字排印，进程迟缓，校订艰难，经两年多的辗转，才于1999年出版。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二、三册陆续出版，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赞扬。公开发表的书评，刊载于《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历史教学》1988年第1期、《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2002年第2期，论者认为本书具有“真、朴、精、博”的学术特点，考核精良，收录广泛，“在史学史研究中拥有不可替代的独到作用”；全书“具备勾画史学发展全景的学术宗旨……为深入进行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与门径”，在学术上做出了无私的奉献。“这样一部著作，帮助我们掌握和了解我国史学发展的梗概，对于研究具体史家或史书也创造了条件，嘉惠后学，其功大矣”。

此外，对本书编纂义例加以细细品味，还有更当彰明之处：

第一，主体内容虽为相关史学资料的原文，但却是以著作家的史识和总结史学发展全局的眼光而致力于资料纂辑，体现出对于中国史学史知识体系的深入理解，采录的内容囊括史学史学科应当关涉的各个方面，尤其对于历代政权官方的史学活动、修史制度格外重视，同时也注意收载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史学史资料。而中国古代史籍异常丰富，因此不可能一览全收、巨细毕载。隋唐五代之前尚可，而自宋代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于史籍刻印之后，史籍数量大增，特别是明代史籍的印行极其纷繁，良莠不齐，很多杂史、笔记，对史学史发展

的影响微不足道，如果试图兼收并蓄、不遗锱铢，不仅不能实现预期，而且必然芜杂混乱、谬误丛生，尽失史学史学科的旨趣。总的看来，杨先生搜辑和选择资料，都经过审视、斟酌，顾及史学史发展的各个层面，但并非有取无舍、并非毫无重点。

第二，本书设计的编年方法，乃首举公元纪年，后列传统的帝王纪年。在政权分立时期，各政权属下在本年若有史学史资料见于选录者，即并立列该政权的纪年年号。这真是极为妥善的处置，其卓越之处，一是以公元纪年系统地展示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时间标示浑然一体、亘古贯通，可便于查阅检索，可与国际学界接轨；二是照顾了沿袭甚久的传统纪年法，适于不同学者治史与考核的需要，但并不认同古人的正统论观念，而并立本年有史学事项的不同政权年号，清晰明了，方便学者运用资料。

第三，史籍编年体的困境之一，是难于安置年代不明的史事。本书在系年方法上多有机动性创造，例如将不明成书时间的史书，系于作者中进士之年、作者卒年、附于作者其他著述成书之年等等，这当然带有估测的约略性质，但毕竟使许多史籍资料的编辑可以操作，而多种方法的运用，亦具有力求接近实际的取向。实际上，大多史书的著成日期，只要编排在其作者的生活年代，就不会影响读者对史学发展面貌的确切认识，在这一点上不必胶柱鼓瑟，关键在于使重要史学资料得以显现。

第四，全书较多引录古代目录学著述的著录资料，此为特点，亦为优点。目录学著述曾被许多学术大家推为入学门径，以纪传体史书《艺文志》、《经籍志》为主体的非解题目录，能够提供史书传世源流的确实信息，有裨于文献考证，是史学史研究可资利用的重要环节，具有不可轻忽的史料价值。而《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等解题目录，对所见典籍予以精练的评介，颇具知识性、参考性、启发性，是学术研究不可不关注的资料。解题目录与原书序跋相比，固然已非“原始”史料，但解题目录大多会传达史书序跋提供的撰述原委，且考论、评析往往比序文跋语更加公允，因为序跋、特别是明代史书的序跋，夸饰、吹捧已为普遍现象，如果缺少解题目录的评论资料，会给初学者带来一定的误导。

但是，杨先生编纂这部著述的年代，各项条件都不能与现今相比拟，首先是稀见史籍和善本史书，分散于全国各地，加之保护性、垄断性管理控制，欲得一观，难乎其难！势必造成资料收集和考订的某些缺环，无法求全责备。近

年来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的出版，更有电子版图书、网络图书的出现，情况大为改观，这是当年学术界所意想不到的发展。其次，当年图书无论编纂还是排版，基本属于手工操作，先是本人或委托他人从书籍中抄录资料，经过删定，再予以誊清。交于出版社后，根据稿本排列铅字，印出清样后反复校订。环节既多，且易造成文字讹误，校订费力费时，疏漏之处难免。因此，在整体文化条件大为改善的情况下，本书前三册实有适度增订之必要。

此次增订工作，总括而言，主要在三个方面力求改善：一是校改原书的讹误文字；二是增补一些必要的史学事项；三是调整和修改一些资料的系年，而使之更加准确。但增订工作不等于重新编纂，应当尽量保持杨先生原书的主体面貌，即不过多地揽入新的、不见得十分重要的史学资料，以免喧宾夺主。由于三册原书的具体情况不同，除皆应致力于文字校勘之外，各册增补、考订亦有因事制宜的偏重，谨择要说明如下：

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起始于公元前 841 年即“共和行政”之年，这是中国具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开始，此种处理无疑是十分严谨的。然而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应当向更久远的社会背景进行追索，本册增订的结果，决定从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朝代起始，因为西周之初的“殷鉴”观念，是中国史学起源的最关键促进因素。虽然西周纪年至今还未能定论，但追溯史学起源状况对于史学史学科而言，尤其重要，不能坐待准确西周纪年的获得。由于上限的提前，导致新增若干史学事项，如《尚书》某些篇目的出现、《逸周书·史记解》的撰写等等。与此同时，依据最新的研究成果，修改了《战国策》、《世本》的成书年代，将之移于第二册。另外，原书第一册没有干支纪年，今经过斟酌，决定自东汉起附入干支纪年法。以上都是增订后较大的变动，其余修订，这里不一一列举。

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二册（宋辽金卷）编纂精湛，此次增订主要是补充了一些重要的史学事项，包括官方的史学举措。例如欧阳修的《正统论》、宋哲宗时期禁毁范祖禹《唐鉴》、李焘撰《六朝通鉴博议》、南宋末年史官高斯得修史奏议等等，不一一列举。其中有国内佚失而尚存于日本的两种史籍，即诸葛深著《历代帝王绍运图》与杨次山撰《历代故事》，也补充编入。个别史书的系年也有所调整，例如将《蒙古秘史》改系于公元 1252 年，并且补充了较多资料。

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包括元代、明代的内容，明代史籍尤其丛脞繁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出版之后，许多此前难以寻觅的史书，转而便于阅览，从而加重了本册的增订任务，取舍之间，不易斟酌。此次增补考订，用力远过于前二册，主要修订工作有以下几点：

1. 补充许多史学事项，其中以史书为主体，亦有史学议论、史学事件内容。例如宋遗民周密的《武林旧事》、《齐东野语》，苏天爵《论修功臣列传疏》，廖道南《殿阁词林记》，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姚允明《史书》，王士骥《皇明御倭录》，郭大有《评史心见》，刘元卿《诸儒学案》等等，不能一一列出。连同其他资料的补充，比原本增加了10万字左右。但添补史书也不得漫无涯涘，因为《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绝不是史籍目录之书，其旨趣在于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过多收载驳杂史籍，于明晰史学发展的大体并无裨益。而甄择去取之间，见仁见智，难免有所失宜，唯祈博雅君子指正与鉴谅。

2. 对原来已经收载之史书，亦择要增补序跋等类资料，同时根据新见资料，对许多史书的系年做出调整和改动，有些改动的时间跨度较大，如王洙《宋史质》、徐学聚《国朝典汇》、程敏政《宋遗民录》等等。改动系年者数量颇多，不必毛举，而这样增订后，不免与原书之资料详略、前后顺序有了较大的区别，但原则上是对原书增而不减，出于对原作的尊重，极少采取删去原有资料的做法。本册有些资料的增补，乃来自日本所藏珍稀版本，例如张居正的编纂《帝鉴图说》，此次补入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代刻本中王希烈《帝鉴图说后序》，有助于考证其书的流布；对于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则增补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全本中的郭子章、许孚远两篇序言，以及该作者《史书总论》等资料。

3. 此次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元明卷），择要补入了几种日本现存中国稀佚的古代史籍，如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鉴》、顾充《皇明一统纪要》、史继偕《皇明兵制考》、张一龙《武库纂略》、林兆鼎《威暨录》等等，这些史籍多数在海外也已成为孤本，而且内容相当重要，予以增补编入，很有必要。

4. 清朝入关前已经具有不少史学性质的活动，原第三册没有涉及，今予以增补，谨按公元年限编入，同时在该年份标示清太祖或清太宗的纪年，与明朝的帝王纪年并立。

此次编纂所成的清代卷，断续拖延，历年弥久。早在2001年中，业师即委令我全部负责编辑，囑言可以邀请一位合作者。我当即说出所欲邀请之人，

并且表明仍须先生主持并且署名。而业师正色指示：此书并非一年、二年即可撰成，自身既然不能审稿、定稿，就不署名，这不是谦让，实际是不愿意为你编纂之书担当责任和名声。届时成书的质量优劣，应当由你负责，无可推卸。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压力，颇生畏惧。随后，杨先生本年在给仓修良先生的信中申明：“拙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已出版三册，至元、明为止，本拟续出第四册（清朝），但因眼力不济，难以完成，现已托我的学生乔治忠及古籍所的另一同志代为编写，写成后署他们的名字，就与我无关了。”

后来，我所邀请、得到杨先生首肯的合作者退出了此事，我个人也忙于其他研究项目，仅分配自己的研究生间断地抄录一些《四库全书总目》中清代史书的提要等等资料。其中侯德仁君于我名下连续研读硕士、博士学业，且立志研究清代史学，所手抄资料较多，花费不少时间。而时代前进，科技发展，学术改观，《四库全书》检索电子版以及其他电子图书日益扩展和普及，使原来手抄的《四库提要》一类资料基本失去利用价值，因为复制、粘贴然后再细致校订的方法，既快捷又可靠，“资料编年”这类书籍的编纂，面临了方式方法的重大转型，许多准备工作虽已耗力不少却归于无用。

至2002年，业师对已经出版的三册《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表达了某些遗憾，只是并没有对我提出予以校正、增补的期许。业师逝世后，我逐渐感觉：似应将编纂第四册与修订前三册结合起来，同时完成和出版，但毕竟未得先师的明确嘱托，处于犹豫、动摇之中。经多次与同门学友谈论，未逢异议，后又得到先生之哲嗣培林君认可，才决定照此办理。于是，连续几届本专业的研究生，大部分多多少少参与了前三册文字录入和校订的工作，参加者及其工作量已经无法确计。其中值得提到的是：已经在扬州大学任教的王嘉川君，也策动和指挥学生参与了此事。增订工作于今日得以完成，可谓为“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结果。而与我全面通力合作且贡献甚大者，乃朱洪斌君。朱君学术扎实，知识渊博，读书极广，专精于史事和文献的考证，有超常之解决难点的能力。在合作过程中，尝使我有“今得朱君，盖为天赐”之叹。

追忆本书增订与编纂历程，多少甘苦，未经历者无从感触，而经历者虽有感触却无法言表。此书迁延多年迟迟未成，是其貌似容易、做起来却时时捉襟见肘、难以措置。更思业师以一人之力，在条件远不如今的当年，竟撰成洋洋三册！因油然而生感愧之情。今所纂成第四册清代卷，努力承袭先师拟定的编撰理路，或许精思、深考未能圆满，但毕竟补上此册，可使整部撰述首尾完具，

似聊可弥补十年间因循、拖沓过失之万一，故述“感言”有如上文，且寄意诗作于下款：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书成寄意（七律）

“编年”三册作丝纶，
义例精微立本真。
辽阔学途须达理，
苍茫史海可知津。
时移世转仍遵嘱，
业继薪传敢续麟。
借问书成何企盼？
后来才彦更莘莘！

2013年4月30日

例 言

一、本书系《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之先秦至隋唐五代卷。《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将历代重要之史学史资料按年编列，以系统地展示中国史学史发展脉络，备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之参考。

二、所标年代首列公元纪年年数，次列各朝帝王年号及年数，后列干支。因所引资料均为旧历年月，故以旧历为准。但旧历与公元存有岁差，为免将旧历一年之事分列两年、或在公元一年中并列两种旧历纪年，故旧历整年史事仍按一般史表通例，编列于旧历岁首之公元年内。帝王年号，起自西汉武帝，此乃合于史实；干支纪年，起于东汉，因干支纪年方法于此时得以稳定，顾及到时代性的整齐，故从东汉之初起始。

三、政权分立时期的年号，如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酌以引录资料所涉及者标示。

四、本书引录之资料，力求以原始资料与最早记载为主，包涵史家、史籍及史事等史学史内容。所录资料，首明出处，涉及稀见文献及其版本，于案语中说明。近人之论述，除有关年代、事迹及著述内容之考订者外，均不具录。

五、历史地理、方志类著作，仅酌取记述全国范围以及对史学发展影响较大者，一般地方志撰述，概不具录。

六、史家之生平事迹，只录其主要经历及有关史学之活动，其他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学、哲学等方面之事迹，一般从略。

七、重要史家之生卒年代均可考知者，除对于史学有重大影响者外，一般只列卒年，不列生年。

八、所列史籍、史事资料之年代，如引录资料无明文记载，则加案语考订，或说明编于某年之理由。若不能确实考订其年代，则附编于某朝灭亡之年，或列入有联系的史事之后。若知该书作者之卒年，则编于卒年之下。对于重要史书，编年首取成书年代，成书年代不明者，再系于相关事件之年。不甚重要史书，可一并系于作者卒年，或编于其他相关事件之年。

九、本书首标年代，次以标题概括所录资料之内容，以下引录原文若干条。原文中有自注或他注者，加括号以小五号宋体字表示。编者另酌加案语，对引

录资料商榷异同、考订旧说或补充文献、提示要旨。于是纪年、标题、资料、案语，四者分列，以求眉目清晰，便于读者参考。

十、本书引录资料原文，但引文之内往往原作者亦有引文，为避免引号的使用层层套叠，故省略整段资料之总的引号，但仍保证文字上忠于原作。

十一、增订资料来自《四部丛刊》、《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禁毁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近年通行的大型丛书者，为节省篇幅而一般不注明版本。

十二、杨翼骧先生原有案语，尽量保留，仍题为“案”；今所订补者，题为“今案”。案语谨以考订史学事实为中心，一般不作无关史实考订的分析评论。所辑补新增资料，一般不另作标示。案语格式分两种情况：随资料文句之后注出者，加括号并且以小五号楷体字表示；在引录资料后另起一行者，首字缩四格以五号楷体字表示。

公元前 1046 年 周武王继位后四年

周武王率师进攻殷商，战于牧野，克灭殷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利簋”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管师，锡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逸周书》（《四库全书》本，后同）卷四，《克殷解第三十六》：周车三百五十乘，阵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商辛奔内，登于廩台之上，屏蔽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群宾僉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悬诸太白。适二女之所，乃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

《逸周书》卷四，《世俘解第四十》：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夫恶臣百人，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御循目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今案：周武王伐灭商纣，是中国上古史第一个重大事件，不仅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意义深远，还是中国原发性产生历史意识、史学意识的重要促进因素，因为这激发出一种“殷鉴”的观念。因此，追溯中国历史学的产生渊源，自当以西周攻灭殷商为起点。然而在学术界，西周克商的年代问题则众说纷纭，至今已有 40 多种不同的见解，实际每一主张都有其面对的困难和矛盾，当下还无法得出公认的结论。在选择任何一种说法都有缺陷的情况下，这里姑且采取公元前 1046 年，因为这是研究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大的“断代工程”所主张的结论，其特点是较为符合历史记载的天象资料。又，史学界研究者多认为周武王继位后，仍以文王“受命”改元的年数纪年，但周文王改元后几年崩逝？则历史记载歧异，有七年和九年的不同说法。但武王继位后四年克商，则可认定，故笔者谨系本年为“周武王继位后四年”。

公元前 1036 年 周公旦摄政七年 周成王七年

西周营建洛邑，《召诰》、《洛诰》、《多士》等篇相继而作。

《史记》卷四，《周本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

《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尚书·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俘来，以图及献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俘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俘从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笃弼，丕视功载，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厥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尚书·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尔殷遗多士，

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至王罚，敕殷命终于帝。嗣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逊。”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用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王曰、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

今案：西周营建洛邑，建设又一都城即“成周”，其间有迁徙殷人，且与西周东征、周公还政相联系，是西周政治史上的大事。在这一系列政治、军事举措中，产生《召诰》、《洛诰》、《多士》等多篇历史文件，对史学的产生也意义颇大，《尚书》这个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或萌发于此时此事。

《尚书·洛诰》末尾标明“惟七年”字样，历代均认为该文献即成于周公旦摄政七年，也就是周公准备还政于成王之年。但王国维《洛诰解》、《周开国年表》（分别见《观堂集林》卷二与《观堂别集》卷一）提出《洛诰》之“惟七年”乃是武王克商后七年，即周成王五年（他主张武王克商后第二年崩），并且认为周成王亲政之前仍以武王克商建立的周元纪年，只称“年数”而不称“祀”，待周公还政后举行“元祀”，方改元称“祀”。但许多学者不完全同意王国维的说法，“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连贯的文句，先言月份、言事体，后言年份，符合西周金文常例，“惟七年”只能是“周公诞保”即周公摄政的年数。1963年宝鸡出土《何尊》其铭文有“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稟武王豊福自天。在四月丙戌……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唯王五祀。”这又涉及经营成周，且时间是“唯王五祀”，于是引起热烈的学术讨论，有据此认为王国维之说得到证明者。而按王国维对“元祀”的解说，“唯王五祀”应是周成王亲政后的五年方可称“五祀”，约在武王逝世后12年，这就正好否定了他自己将《洛诰》定为武王克商后七年的说法，因此，不少学者仍然肯定《洛诰》等文作于周公摄政七年，王国维说法不能成立。